参考资料

德 国 快 讯

2014 年第 14、15 期 · 总第 614、615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德国问题研究所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 期 主 要 信 息

政治动态

- 放弃艾哈德：德媒评默克尔的经济政策
-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生效
- 谁来决定武器出口?

经济纵横

- 德国失业人数继续下降
- 联邦环境署欲禁止页岩气开发
- 德国面临“去工业化”威胁？

社会万象

- 德国东西部托儿所质量差距大
- 法院裁决前总理科尔录音资料的归属

****

热点透析

- 不情愿的女权主义者：默克尔 60 岁了
- “德国的世纪”
- 德国反犹主义：一个关于团结的问题
- 必须示强：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

放弃艾哈德：德媒评默克尔的经济政策

《南德意志报》7 月 17 日评论　默克尔的经济政策在她担任联邦总理前后判若两人。她曾经的原则是："尽可能多的自由，国家尽可能只在必要时干预。"可如今她正在加强国家干预，引入了育儿津贴和最低工资制。

秩序政策

一些批评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和在秩序政策领域喜好评价默克尔的人说：这个女人没有原则，至少没有秩序政策的原则。秩序政策是一个来自 2005 年以前老联邦德国的词，这一年默克尔开始担任联邦总理，从此由她做政治决策。德国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认识没有默克尔当领导人的德国，同时也不再知道什么是秩序政策，即一种确定经济过程发生框架的经济政策，既不让经济自由放任，也不事事规制。这个框架可松可紧。2005 年以前，秩序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个框架可以较松，要给公民和企业发挥的可能性，简单地说：尽可能的自由，国家尽可能只在必要时干预。当然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国家尽可能多干预，仅在需要的时候给予自由。如果这么看，就不再是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意义上的秩序政策了。艾哈德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社会"是为了用于平衡，可以帮助弱者。但是重点还是"市场经济"，它指的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经济增长和富裕完全自由，不由国家下达指令。首先得挣钱，然后才能再分配，基民盟的党纲中就是这样写的。可这也是基民盟主席和艾哈德继任者默克尔的信念吗？有这一疑问的人会看到两个默克尔：2005 年之前和之后的默克尔。1990 年，她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新的经济秩序下创造价值，那么我们就不能在社会和生态领域进行再分配。"2003 年作为反对党成员的默克尔在红绿政府执政期间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市场经济"，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多劳多得，个人为自己负责。而如今，默克尔在不断增强国家的力量。

税收政策

在与施罗德（社民党）和菲舍尔（绿党）对决的联邦议院大选之前，在基民盟著名的莱比锡党代会上，默克尔主张一个简单、公平、有效的税收法。"啤酒垫税收政策"（Bierdeckelsteuer）虽然不是源于她，但它是默克尔纲领的一部分。可是现在默克尔阻挠每一个试图展开的税收讨论。对于她和财政部长朔依布勒来说，避免提高税收就已经是雄心勃勃的目标了，同时国家税收也前所未有地高。2003 年的默克尔肯定会极力反对这种疲软的税收政策状况。

医疗政策

默克尔当年要改革医疗体制，降低额外成本。不论是经理人还是护士，每个人都必须缴纳同样的门诊费。在上周，该政策被最终取消。

基础设施

当年的默克尔知道加强基础设施和推进创新的必要性。如今，默克尔可能依然知道这种必要性，但是却坐视联邦预算中基础设施开支如此之低，而基社盟的相关主管部长也过分地纠结在收取汽车过路费这个副战场上。

救助欧元

默克尔当年不仅指出，欧元危机中，公民自己，包括欧盟层面上各成员国都要为自己负责。可现在，她主导了欧元国家支出数十亿欧元来援助债台高筑的国家，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包括支持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宽松的货币及信贷政策。

能源转向

默克尔亲自做出退出核能的决议，但是她错过了从中制定真正的可替代能源政策的机会。德国人至今依然不知道能源转向往何处去，其最终的成本会有多少。

务实家

默克尔的粉丝都会说默克尔在金融危机中经历了一个学习过程，金融危机打破了很多事情包括在经济学领域的确定性。在 2007 年后最艰难的阶段，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在接受检验。默克尔非常小心谨慎，人们试图在她身上找到某些原则、某些主旨言论和个人指南针均未果。事实是：等待，在可视范围内行动，跟着事件摇摇晃晃地走。《时代》周报曾经说默克尔制定的是“醉酒状态的经济政策”。这么做的人，一般不会全盘皆错，而正好相反，还可以获得眼前的成功。眼前问题马上就解决了：保持欧盟峰会的和平；排除政治对手。2005 年以后的默克尔接连在选举中获胜，那么我们还可以因为她摇摆的路线而生气吗？当然可以，特别是从历史的维度看，因为默克尔的原则估计最终就像德国现在经历的经济繁荣那样。不久前，Prognos 研究所描绘了德国今后几年的情况，堪称“了不起”，是“黄金二十年”。但是该研究所的调查里也写道，之后将会迅速走下坡路，德国将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组织成本高昂的国家。到时候默克尔就不是联邦总理了。遥远未来的发展形势在今天已经出现苗头，可默克尔著名的实用主义是不会看得那么远的。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生效

《每日新闻》8 月 1 日讯 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正案于 8 月 1 日起生效。《可再生能源法》是一部旨在促进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法律。然而在过去几年，电力消费者的成本增长迅猛，目前为 230 亿欧元。改革《可再生能源法》的目的在于减缓电价增长的势头。那么修正案带来了哪些变化？

企业优惠条款：与私人消费者和小企业不同的是，《可再生能源法》减免了耗电巨大的企业的可再生能源分摊费。欧盟委员会认为优惠条款是德国政府给予德国企业的非正当辅助，并要求限制补贴。尽管如此，还是将有 1700 多家企业可以减免较多的分摊费。德国政府还给予其他很多企业很慷慨的“特殊减免规定”。

自行发电：很多企业和公民自行发电，他们在修正案生效之前完全不用缴纳可再生能源分摊费。现在引入了“能源团结费”：自行发电者也必须先缴纳 30%的分摊费，2017 年起则将缴纳分摊费（6.24 欧分/千瓦时）的 40%。发电功率在 10 千瓦以下的自家屋顶上的太阳能发电装置依然享受免费待遇。

陆地风力发电：将限制修建陆地风力发电站，每年最多增加发电 2500 兆瓦（相当于两个中型核电站的发电量）。对风电园的初期资助降到 8.9 欧分/千瓦时。这适用所有 2014 年 1 月 23 日后修建的风力发电装置。还有一个变化：联邦州到 2015 年底可以自行规定风车与住宅之间可允许的最小间距。

海上风力发电：海上风力发电的高补贴（18 欧分/千瓦时）保留，但是下调扩建目标。原本计划 2020 年新装机 10000 兆瓦，现在下调到 6500 兆瓦，2030 年的目标为 15000 兆瓦。

生物质能：由于玉米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张，新修正案规定生物质能每年新增发电的上限为 100 兆瓦。新建生物质能发电站必须用垃圾和废料作为原料。

德国考虑大型项目实施的改革

《明镜》周刊网站8月4日讯 柏林机场、汉堡易北河音乐厅、柏林联邦情报局总部大楼：只要是政府作为建设业主，事情肯定做不好。成本超支、交付日期一拖再拖。因此建设部长亨德里克斯（Barbara Hendricks，社民党）让相应的联邦议院委员会调查联邦大型建设项目的现状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明镜》周刊列出的清单还是让人吃惊，因为它证明了联邦在大型项目上出现系统性失败。40 个项目中仅有 14 个在最初的预算计划框架中。三分之二的项目高出预算，并且大部分情况公众都不知情，而且预算超出情况惊人：一个病毒研究所要花费 3.4 亿欧元，而预算为 1.5 亿欧元；教育部在波恩的一个建筑项目比预算高出 29%；位于多特蒙德的联邦劳动保护局的建设项目甚至超出预算 80%。项目预算总计超出 10 亿欧元。这些数据显示，联邦重新思考大型建设项目的计划与实施的状况是当务之急。其中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年多前，“大型建设项目改革委员会”曾经思考过如何保证将来“成本真实、成本透明和按期完成”。30 多位专家就如何更好地估算风险以及如何让数字化发挥作用进行了讨论。最终，也许是明年将出台一本《大型项目手册》，旨在对未来的建筑规划提出实施建议。

德国新设促进项目挽留青年学者

《法兰克福汇报》7月30日讯 很多学者离开德国到美国或者瑞士，因为那里有更好的教席，有更多时间从事科研。在过去几年，大约 2.3 万名科学家离开德国，因为国外的科研条件更好。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项新的促进计划，希望留住年轻学者。这项名为 Prime（Postdoctoral Researcher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Experience-Programm）的计划由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提供，在国外从事科研的博士生回到德国后可以选择在德国大学获得一个固定职位。受项目资助的青年学者获得的不是奖学金，而是一个职位。该计划的资金来自联邦教育与研究部以及欧盟 Cofund 计划 （Marie-Curie-Maßnahmen，“玛丽-居里”人才培育计划。此计划可以资助青年学者在国外进行科研一年，之后在德国大学工作半年，实现回国后无缝衔接。这是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首个不限定国籍的青年学者资助计划。在很短时间内，已经有 344 名申请者，国际专家评审委员会挑选出其中的 31 名，他们来自人文、理工等不同学科，很多人在跨学科领域工作。联邦教育部长万卡（Johanna Wanka，基民盟）说，对该项目的巨大需求说明，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对长期在德国科学机构工作很有兴趣，也很欣赏德国的科研体系。据统计，2006-2011 年间，有 23500 名科研人员离开德国，而来到德国的科研人员有 19500 名。

谁来决定武器出口?

《法兰克福汇报》7月31日评论 德国的军事工业现在给人一种政治上无人负责的印象。联邦经济部长加布里尔说，他不认为武器和军事设备出口应该按照经济政策的标准来衡量。当然，法律对武器出口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加布里尔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他不必为军工业做决策。然而，军工业出口应该属于他的职权范围。联邦政府是否要重新更改职权分工呢？可国防部长到目前为止也拒绝回应关于武器出口的任何问题。她在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卷进军备计划中。关于武器出口，她始终指出，这个“谢天谢地”应该由他的同事加布里尔负责。反对党乐于见到大联合政府对军工业这种扭扭捏捏的态度，他们一有机会就打出道德牌来进行攻击。这样的机会还很多，大联合政府自己就不断地在为反对党提供机会。关于增加被批准的武器出口的报告义务，联盟党和社民党在这点取得了一致。现在，

每一笔经联邦安全理事会（这是一个内阁委员会，由总理府和五位部长组成）批准的武器出口业务都必须在两周内向议会申报。这样，政府的解释压力增加，如果政府不修改目前的责权分配，那它承担此压力的能力将变得有限。总之，安全政策显然还是没有始终如一：一方面，要将联邦国防军改革成为在全球可以执行任务的职业军和志愿军，而另一方面，又不商议如何装备联邦国防军的问题。自冷战结束后，军工业大大缩减（至今只有 10 万个工作岗位），已经不能称为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否则，经济部长加布里尔也不会对其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军工业在安全政策上的意义并没有随着其规模的减少而相应减少。恰恰相反：在阿富汗的事实证明，将德国的士兵用好的装备武装起来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联邦政府希望本国军工业必须保留哪些技术能力的问题与武器出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对武器出口出于道德原因而像迄今为止这样被大加限制，那么就必须因为安全政策的考虑增强补贴相应企业的意愿。工业界已经特别提出，希望政治上能澄清这个问题，但没有获得任何答复，政府有经济政策（垄断经济）方面的顾虑。面对这个问题，德国军工企业和政界还有一个出路：他们可以尝试通过欧洲范围的合并来平衡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和不断下降的产能。德国的政策在这一方面没有主动进行改变，而是保持容忍态度。两年前，柏林阻止了法德空客集团与英国军工企业英国宇航系统公司（BAE）的合并企图，当前德国坦克制造商克劳斯-玛菲·威格曼公司（Krauss-Maffei Wegmann）与法国奈克斯特（Nexter）企业的合并遇到的政治阻力较少。政策本身也可以在军工行业内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欧盟成员国做出了共同研发无人机的意向声明。早期欧盟共同的研发（如欧洲战机或 A400 运输机）却证明，一旦欧盟计划中附加了太多各国的修改意愿，结果并不是很好。军备政策欧洲化的最重要的后果一直未探讨过：后果之一是联邦政府可能让渡部分关于武器出口的决定权。可欧洲战机在这一点上也有教训：原本联邦安全理事会不会批准出口这种战斗机到阿联酋，而德国政府始终没有对英国政府的批准做出评论。也许对联邦政府而言，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来，联邦州州长将尽力争取在军工业的工作岗位，就像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基社盟）那样，而关于出口则由巴黎或者布鲁塞尔来决定。

德国多个城市举行抗议以色列袭击加沙的游行

《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26 日讯 在多个德国城市，数百人举行了抗议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的游行活动。抗议人士要求长期停火。参加抗议的人数比预期要少很多。根据目前的报道，与过去几天的抗议游行相比，最大的区别是这天的抗议行动没有使用反犹言论。在慕尼黑的奥尔里恩广场，有 800 多人游行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袭击，游行的发言人强调反对使用反犹言论。在吉森，据警方的数据，大约有 500 人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参加抗议的人数大约为 400 人，游行的组织者原本预测有 3000 人参加。游行的发言人要求冲突双方都做出让步，也特别反对哈马斯使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目标。在德国北部也有多个城市举行了抗议游行。汉堡有大约 800 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比如“立刻停止加沙的民族屠杀”，或者“给巴勒斯坦的儿童以未来而不是死亡！”。抗议的组织者原本估计有 2000 人参加。在基尔大约 120 人举行了抗议游行。

经济纵横

德国六月份通货膨胀率保持低走

《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11 日讯 德国通货膨胀率保持低走。根据联邦统计局的统计，6

月份德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比上一年平均增加 1.0%，仅略高 5 月份 0.9%的低通胀率，远远低于欧洲央行 2%的物价稳定标准线。其中房租、部分服务和旅游比平均通胀率略高，稳定的食品价格和不断下降的能源价格起到了降低通胀的作用。

房租（不含水电煤和暖气）提高了 1.5%，这个涨幅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德国普通家庭平均消费开支的五分之一是用于房租。服务方面，比如身体护理、理发都涨价了，涨幅为 4.0%。旅行社包价旅游费用也增加了 2.6%。蔬菜价格明显比 2013 年 6 月低，比如黄瓜便宜了三分之一，生菜便宜了 26.7%，土豆价格降低了 22.1%，西红柿则便宜了 9.6%。水果的价格也有所下降，便宜了大约 3.1%。奶制品的价格则提高了，如奶酪贵了 14.7%，奶油的价格提高了 8.4%，酸奶价格涨了 7.4%。能源价格也下降了，总共下降 0.3%：轻质燃油降价 1.9%，汽油和柴油价下降 1.1%。电价相反涨了 1.8%。根据联邦统计局的统计，娱乐电子设备明显降价，电视机比去年便宜了 6.1%，电话则便宜了 11.6%。慕尼黑信息研究所预测 2015 年由于可能出现的经济繁荣，通胀率有可能提高，大约在 1.7%，比 2014 年的 1.1%略高。“这主要是劳动成本可能增加，因为产能逐渐被充分利用，同时将实行法定最低工资。”

德国失业人数继续下降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7 月 31 日讯 据联邦劳动局的统计，德国 7 月份的失业人口为 287.1 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4.3 万人。失业人口比预期要下降得多。与 6 月份相比，失业率则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达到 6.6%。联邦劳动局表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夏季暂休，而这个攀升的数字比一般 7 月份要少很多。联邦劳动局局长弗兰克-于尔根 •魏泽（Frank-Jürgen Weise）说：“就业市场总的说来保持稳定。”除去季节影响因素，7 月份失业人口净减少 1.2 万人。银行经济学家原本预期失业人口减少 5000 人。

德国面临“去工业化”威胁？

《法兰克福汇报》网站 7 月 31 日讯 德国经济界警告：高电价可能将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和就业岗位赶到能源便宜的美国，大量投资也可能因此而削减。当然，经济界的这种警告现在听起来没有像可再生能源改革开始之前那样耸人听闻，何况一直存在争议的工业能源优惠政策还毫发未损，但是一些能源消耗大户还是警告说高电价会给德国带来严重后果，同时他们也肯定地表示：美国的外来企业增加与德国企业大规模减少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8 月 1 日《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生效，跨国企业巴斯夫认为：“（能源价格的）调控细节将会带来什么影响还很难说。”巴斯夫已经公开表示，由于较高的能源价格，将削减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本土投资。同时，由于页岩气开发带来的燃气价格下降，巴斯夫增加和扩建了在美国的业务点，包括在德克萨斯州。德国政府给予能源密集型企业的优惠政策造成了普通用户的可再生能源分摊费的增加，尽管与欧盟委员会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但是该政策并未依照批评者的要求改变很多。优惠总额大约保持在 50 亿欧元左右。用电密集型行业联合会主席罗特梅尔（Jörg Rothermel）说：“新的《可再生能源法》不会带来大的震动。”可再生能源促进体系依然复杂，最低可再生能源分摊费翻了一番，为每度电 0.1 欧分，这给企业的负担还是蛮重的。电力消耗大的企业，如钢铁、建材、化工和造纸等，考虑增加在美国的投资不在少数。德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在德国总的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历来就很高，大约为 10%。宝马和大众最近还扩建了美国的工厂，梅赛德斯也刚刚扩建了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工厂，这里生产的车辆用于出口。根据 2013 年底德美工商会的一项问卷调查，四分之三

在美国的德国企业计划增加其员工人数。除了基本区域优势，比如较好的市场准入、低换汇风险和较低劳动力成本，还包括明显便宜的能源价格——美国页岩气的开发是主要原因，现在美国的电价仅只有德国电力交易市场电价的一半。虽然德国短期还不会出现大面积的投资减少，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不排除由于较高的能源价格出现投资的“悄悄转移”。例如，按照新规定，电力自给自足的企业也必须参与可再生能源的扩建资助。巴斯夫对此批评说，这将造成规划的不确定性。金属经济协会主席克耐尔（Martin Kneer）提醒说：政策应该为信心提供基础。罗特梅尔想表达得温和一些：虽然德国企业不会赌气说立刻关掉本土工厂，并转到其他国家开设新厂，但是他们认为新的《可再生能源法》并没有解决电价持续上涨的问题。但巴斯夫认为，有类似他们这样想法的化学企业还不少。2012 年德国化工行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 14 亿欧元，高于本土投资，其中大部分，大约 41%是投在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和环保协会，包括反对党绿党都认为企业的这种抱怨毫无道理，因为这些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生效后依然享有减免可再生能源分摊费的优惠政策。相反，本来政府许诺减少普通消费者和小企业大约 10 亿欧元的负担，但这个承诺没有实现。工会担心的不是所谓的“去工业化”危险，而是德国在未来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

联邦环境署欲禁止页岩气开发

《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30 日讯 联邦环境署打算阻止在德国进行具有争议的页岩气水力压裂法开发。联邦环境署提交了长达 600 多页的鉴定书，新署长克劳茨贝格尔（Maria Krautzberger）说：“我们基本上认为这种技术的危险性太大。”虽然通过制订法律在德国全面禁止水力压裂法开发页岩气的难度很大，但是利用快速、严厉的环保与健康保护的法律框架规定还是能够实现类似禁止的效果。这是联邦环境署向联邦经济部和环境部提出的明确要求，虽然这两个部已经呈交了规制页岩气开发的基本要点文件，但是联邦环境署认为这个速度太慢，它们应该更快地体现到法律中去。克劳茨贝格尔强调：“水力压裂法依然是一种有风险的技术。”应该修正有关水经济的法律，禁止开采页岩气，特别是在水域保护区域、湖泊流域区域、水坝和自然保护区，任何形式的水力压裂法都应该毫无例外予以禁止。同时，环境署还建议对所有水力压裂的油气开采计划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环境承载力测试，即使是试验开采措施也必须这样。环境署发言人表示，暑假过后将开始制订法律草案。在由环境部和经济部提交的基本要点文件中，人的健康被提到最高的获重视得地位，因此对环境有毒害的任何开采技术都将被禁止。环境署发言人说：“我们对饮用水的要求要严格到水力压裂法不久在德国将完全不可能使用。”

社会万象

德国东西部托儿所质量差距大

《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25 日讯 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德国托儿所缺少幼儿教师。全德国大约还需要增加 12 万个全职幼教岗位才能比较合适地满足托儿所的需求。根据基金会的计算，这意味着每年要额外增加 500 万欧元的费用，这一事务内的人事花销也需要增加越三分之一，总计达 190 亿欧元。此外，贝塔斯曼基金会董事会的德拉格尔（Jörg Dräger）先生还敦促实行全德国适用的托儿所质量标准。他说，法律规定的获得入托位置的权利已经迫使联邦各州增加了托儿所里的位置，现在还需要法律保证所有托儿所的入托质量。各联邦州在儿童看护这一领域的水平大相径庭。根据基金会的此项调查，德国东西部存

在很大的差距。东部托儿所平均一个幼儿教师需看护 6.3 名幼儿（3 岁以下），而在西部只有 3.8 名。调查显示，不来梅和巴登-符腾堡州在这方面表现最好，幼儿教师与儿童比例分别为 1:3.2 和 1:3.3。看护 3 岁以上儿童的托儿所的情况类似：西部一名教师必须看护 9.1 名儿童，而东部则高达 12.7 名。在这一统计中，不来梅和巴登-符腾堡州再次名列前茅，分别为 1:7.7 和 1:8。贝塔斯曼基金会认为，看护 3 岁以下儿童的托儿所，一名幼儿教师最多应只负责 3 名儿童，而看护 3 岁以上儿童的合适比例应为 1:7.5。很多联邦州距这一标准相去甚远。因此基金会呼吁制订联邦托儿所法，对托儿所的任务和质量标准加以规定，包括教育、培养、专业咨询和午餐的质量标准。2013 年 8 月 1 日起，3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有权利要求获得一个公立托儿所的入托位置，其形式可以是在托儿所或者雇佣日班保姆。虽然过去几年托儿所里的位置一直在增加，但是总的说来还是缺乏。至 2014 年 3 月 1 日，近 66.2 万名 3 岁以下的儿童获得了入托位置，这只占该年龄段儿童总数的 32.5%。原本计划在法律生效时，至少有 75 万个入托位置。

法院裁决前总理科尔录音资料的归属

WDR（西部德国广播电视台）网站 8 月 1 日讯 8 月 1 日，科隆最高地方法院裁决，前联邦总理科尔可以自行保留录音资料。2001-2002 年间，记者施万（Heribert Schwan）录制了与前联邦总理科尔长达 630 小时的对话录音。这些录音被当作了科尔回忆录前三卷的基础。科尔要求施万返还所有的录音资料。施万最初保留了部分，但是在科隆法院做出裁决后，他就必须归还全部，科尔有权自行保留所有资料。科隆最高地方法院民事判决委员会认为，在科尔回忆录撰写过程中，科尔“拥有惟一的决定权”。首席法官诺尔特（Hubertus Nolte）说，施万仅仅是“代笔”（Ghostwriter），“因此必须完全待在幕后”，科尔有权随时且不给出任何理由终止与施万的合作。记录科尔言论的录音“完全不能与记者日常事务中的采访相提并论”。 施万首先提出了让地方法院对这些录音资料进行裁决的要求，他认为自己拥有录音中提出的访谈问题的版权。地方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要求，但是允许联邦法院对判决做出修正。施万打算继续申诉。但如果需要联邦法院继续判决，费用将会非常高昂。因此施万呼吁阿登纳基金会和其他基民盟政治家如诺伯特·布卢姆（Norbert Blüm）、 海涅尔·盖斯勒（Heiner Geißler）、伯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和库尔特·比登科普夫（Kurt Biedenkopf）能共同承担这些法律费用。如果联邦法院最终裁决他有最终支配权，他会同意将录音交给阿登纳基金会供其使用。一些政治学学者也赞同将资料归档。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迈耶（Tilman Mayer）说：“科尔不是路人甲。我认为，大家可以期望他将以职务内容为主的遗留资料向公众开放。”另外，施万应该有共同拥有权，“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些录音”。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克尔特（Karl-Rudolf Korte）要求开放所有资料，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它们开展工作。“联邦总理一直都是工作状态”，克尔特说，“民主需要有理有据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可以通过档案资料再建构”。 克尔特赞同录音在科尔那里保留一定期限，之后应该向公众开放。

****

热点透析

不情愿的女权主义者：默克尔 60 岁了

《每日新闻》网站 7 月 17 日　默克尔曾经绝对不愿意成为一种人：女权主义者。她即将 60 岁，其实她或多或少就是一位女权主义者。默克尔更看重事情本身，而公众常常将她和女性角色联系到一起。

在默克尔所做的无数演讲中，我们想不起是否有一个曾让人感动得流泪。丰富的感情与热情洋溢并非她的风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过去几年从未看到哪怕一次关于默克尔作为基民盟党主席和联邦总理“力不从心”的报道，这个形容词以前总爱用在身居高位的女性身上。在这个意义上，默克尔虽然完全不像一位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的言行举止都与普通的女性角色形象完全决裂，就像一类不情愿的女权主义者。

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2004 年《柏林日报》在几位男性基民盟政治家终止了政治事业、朔伊布勒也未被提名为联邦总统候选人后曾评论说：“现在有些人被挂在默克尔肉铺的肉钩上。”正因为她非常冷静且就事论事地对待党友，所以她完全不符合女性的这类标签：女上司一般更和蔼些。1991 年默克尔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可以和男人一样强硬。”总之，德国资深女权主义者阿莉塞·施瓦策尔（Alice Schwarzer）早年喜欢亲近默克尔，并邀请默克尔和几位精心挑选出来的知名女记者在柏林共进晚餐并非偶然。

她并不维系“Amigo-System”（人脉系统）：她曾通过《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文章扳倒了自己的提携人科尔；也曾将以前的敌人考德（Volker Kauder）提拔为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之后还将其选为基民盟秘书长，虽然考德在 2002 年曾反对她当选总理候选人。她还“怀着沉重的心情”免去了亲密的政治同伴、前教育部部长沙万（Annette Schavan）的职务，让其退出内阁，因为后者被爆出博士论文剽窃丑闻。在献金丑闻中，默克尔与其“政治生涯的养父”科尔决裂，之后取代朔伊布勒成为党主席。

当然，默克尔作为女性的角色在政治中一直发挥着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她很清楚自己 1990 年后早期的政治生涯部分得益于当时的时局，因为“那时候正需要一名女性”。她被选为科尔政府内阁的家庭事务部长，她对待自己的职务非常认真、冷静和积极进取，此后作为环境部长也如此。在这两个领域内，她逐渐让基民盟现代化，以至于批评者指责她让本党“社民党化”，其实她对基民盟一直在进行本党和选民容忍范围内的现代化改革。可尽管如此，基民盟还是出现失衡：基民盟在大城市很成问题。她刚刚失去德国十大城市的最后一位基民盟市长。基民盟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城市人那里——包括很多女性、移民、同性恋和社会底层民众——不受青睐。是因为国际政治家默克尔这几年因为欧元危机而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吗？默克尔具有改革精神，她一再表现出这种精神，比如在 2003 年著名的莱比锡党代会上。不过她的政治风格是“迈小步”，像施罗德那样进行《2010 议程》改革的大手笔不是她所追求的，尽管她不知疲倦地反复强调，迄今德国恰恰从《2010 议程》受益匪浅。

不过，默克尔至少非常清楚，基民盟在社会议题领域必须要有所改变，必须继续现代化。目前已经有基民盟专员在制定《大城市文件》（Großstädte-Papier），新任基民盟秘书长陶博（Peter Tauber）将在内容上给予支持，他想更多地面向新的目标群体。陶博比默克尔年轻近 20 岁，是默克尔给自己找到的新的支持者。他来自黑森州，参与了黑森州黑绿联盟谈判：了解默克尔用人策略的人都知道，这也并非偶然——下次联邦议院选举，默克尔可能会考虑黑绿联盟。

对于默克尔来讲，女性理所当然应该参与到各个层面中去，但是她也清楚，这个社会还远不是她期望的那样。在她身边多年来有两位女性幕僚：一直非常低调的贝阿特·鲍曼（Beate Baumann），50 岁，从 1995 年起就主持默克尔办公室事务；之后还有爱娃·克里斯杨森（Eva Christiansen），基民盟党发言人，是默克尔的媒体军师。克里斯杨森四十出头，既要忙于总理府工作，还要单独抚养孩子。默克尔非常支持她的育儿假，也很注重她的感受。默克尔的前任科尔则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也不能说默克尔只靠“娘子军”，在她身边与她密切共事

的一直有男性政府发言人，都是她非常需要的、善于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人。她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接受采访以外的事情，更别提接受摄影记者拍照了。只有常常应邀去总理府的一些主编才有机会认识到默克尔几乎从未在公众面前显露的另一面：闷闷不乐、沉默寡言，甚至傲慢。

这个女人想干什么，到底是什么让她在政界有如此冲劲？即使伴随她很长时间的人也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在摄影记者赫尔林德·科尔伯（Herlinde Koelbl）早年的访谈中，默克尔承认自己疑心越来越重，这个到今天也能让人觉察到，她不愿意向人袒露内心。科尔伯在上世纪 90 年代说服了默克尔参与一个长达 8 年关于一本书的采访项目，书名为《权力的痕迹》。默克尔不久前向《时代》周报透露说：我居然答应了这个项目，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感到吃惊。

“德国的世纪”

《法兰克福汇报》7 月 28 日评论 在自信、可亲地赢得本届足球世界杯后，再次响起了“德国的世纪”的呼声。德国的确在很多方面堪称楷模。但是其危机也显而易见。国家足球队的胜利似乎证明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成功。史学家耶克尔（Eberhard Jäckel）曾经将他 1996 年出版的一本书取名为《德国的世纪》。作者回顾历史，得出结论，欧洲甚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有如此大的影响。就连美国的崛起也完全是因为德国。美国《新闻周刊》杂志再次喊出“德国的世纪”，虽然我们这个世纪开始的时间还并不长。所谓“德国的世纪”并不是指可观察到的与 1914 年以及之后的相似性，而是指德国取得的成功（当然这也的确会让人想到 1914 年），本届世界杯的胜利给这个成功带上了桂冠。体育的佳绩显然证明了整个社会的成功，经济数据就是直接的明证。在很多方面，德国的确堪称楷模：它在欧洲的实力遥遥领先，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力量强，是欧元区的稳定锚。大部分德国人都为德国显而易见的富足感到高兴。虽然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但是高社会保障带来了社会内在的和平。联邦制颇有成效地将资金在不同地区合理均衡分配。出于竞争因素的考虑，可能会有人对这样的资金平衡摇头，《基本法》中要求的同等质量的生活水平也造成了国内的一些紧张关系，但是也缓和了新老联邦州的矛盾，其结果是不仅“很酷”的首都柏林（尽管有很多领“哈尔茨四”社会救济金的人）很有生活质量，在很多其他地方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些都依靠坚实的物质及法律的基础设施。德国公民基本可以放心：梁柱不会倒，机器正常运转，救护车及时赶到，法律保障机制有效运行。当然，这些无疑会带来官僚，它既是德国的强项，也是弱点。是行政管理而不是战略构建被视为德国的特点，它在极端的两面中表现其威力：德国瞬间做出了退出核能的决议，义务兵役制也迅速被取消。虽然这两个决策在政治上都有问题，在法律上也存疑，而且代价很昂贵。但是在国际上德国似乎给人这么一个牢固的印象：如果真要做成什么事，那肯定是德国人。事实上，高生活质量也与德国对生态的癖好相关，这个癖好常被人嘲笑，但它带来了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毫无忌惮高速发展的国家也意识到自己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结束义务兵役制带来了对联邦国防军后继无人的担忧，它一方面说明财政紧张，但另一方面也象征德国基本实现了全民富裕。

富裕的同时也有隐忧。社会和外在的和平是靠财力维持的。可谁在将来能照顾那么多老人？谁来支付养老金和退休金？如果福利国家在财政上无以为继，或者生活贫困和绝望的人在选举中选举极端势力的政党怎么办？我们如何挑选应该留在德国的移民？况且，如果德国受到威胁，谁的手里还握有武器？如今的德国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它没有明显的战略野心，因为它虽然强大，但是不愿成为欧洲霸权；因为它虽然属于西方，但是也不愿毁掉在俄罗斯的地位和在阿拉伯世界的好名声，愿意担当“诚实的掮客”。德国虽然不是在国际上四

处干预的大国，但理所当然属于竭尽全力为化解冲突寻求解决办法的国家。20 年前，耶克尔在他的书的末尾写道，不排除俄罗斯尝试再次建立帝国，这将导致新的冲突，“德国免不了会被卷入冲突”。此言极是！不过他可能错误地预言德国的世纪已经结束。一个在上世纪以极端方式到处留下痕迹的国家现在被尊为楷模，似乎有些让人羞愧。如果不忘记历史，不失去历史的眼光，那么，长此以往这就只会有好处。

德国反犹主义：一个关于团结的问题

《南德意志报》7 月 31 日评论 加沙冲突引发了关于反犹主义的讨论：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夏洛特·科诺布洛赫（Charlotte Knobloch）说，很多犹太人正在经历“1945 年后最苦恼的日子”，她抱怨德国反对反犹主义缺乏团结。但是：究竟应该呼吁哪种团结呢？德国犹太人社区在慕尼黑召集群众集会反对反犹主义时，一位天主教副理主教说，他“在这里代表我国的天主教徒”。集会的组织者认为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天主教徒自己没有来，而是乐于被人代表。全德国几乎没有显示团结的反对反犹主义的集会。在慕尼黑的集会，只来了几百人，不过至少他们是非犹太人。联邦总统高克针对德国一些城市的反犹游行呼吁公民，积极反对反犹主义。如此呼吁团结的原因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感受完全不同。由于加沙冲突，德国一些城市出现了打着反犹标语的反战游行，警察在刚开始还允许了这些游行。德国的犹太人将这种反犹游行视为对他们生存的攻击，而非犹太人则仅仅将这些行为视为不尊重。当然，非犹太人现在也将极端的巴勒斯坦人和所有政治顽固分子视为一直都存在的一帮人，但他们不会再威胁到我们现有的文明。不论是右翼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在东部的选举结果，还是乌珀塔尔犹太教堂的纵火案，都没有改变非犹太人的这一看法。大部分人认为纵火案是单独犯罪事件，不是什么反犹凶兆。巴伐利亚州农业部长克里斯蒂安·施密特（Christian Schmidt，基民盟）在慕尼黑的集会上说，“如果有需要”，绝大多数人都会一起站出来的。

他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需要。为什么大部分人待在家里而没有来参加广场的集会呢？除了刚才解释的原因，应该还有第二个原因。于是就冒出这样一个问题：被呼吁的是哪种团结呢？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和犹太人社区真的只是呼吁反对反犹主义的团结吗？或者他们还想呼吁与以色列政府的团结，为他们摇旗呐喊？科诺布洛赫在请愿大会上担忧的不仅仅是“在德国家乡的犹太人的未来”，她还说，“我们支持代表自由世界的那些国家捍卫反对野蛮恐怖行为的价值观”。谁会为这样偏视的意见拍手称赞呢？在加沙冲突中，已经有 1300 名巴勒斯坦人和 56 名以色列人丧生，这怎能证明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仅仅是“捍卫”？以色列空军轰炸学校、住宅和当地惟一的发电站，以色列政府不断夺走约旦以西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色列动用了物理及结构暴力，从远观，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评价：以色列将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只使用它自己的公民身上。科诺布洛赫没想到要对以色列这些行径说些什么。如果真有上万人参加反对反犹主义集会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即使真有这么多人示威，也不能说明是因为民主受到了威胁，它仅仅说明，有很多热心的人想安慰犹太人，让他们不要害怕。换个思路积极地想：大部分人没有来参加集会应该让人感到放心，这说明大部分公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他们觉得犹太人理所当然属于整个集体，不必要额外多加强调。如果把参加集会的架势弄得像是为了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这才让人不放心呢。

必须示强：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

《南德意志报》8 月 3 日评论　“光制裁还不算是政治”，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说。所以他还要继续与俄罗斯领导人对话。可是光对话也不算是政治。只有我们知道在对话中要达到什么目的，并且对确实可行的东西有个现实的设想，那么对话才算是政治。前提是，尽可能清楚是和谁在对话：对话方的目的是什么，对方为实现自己的目的愿意采取什么手段？在与俄罗斯打交道的情况中，目前德国以及任何西方国家都不知道以上问题的答案。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地区开始的一系列事件粉碎了我们对俄罗斯总统普金的很多设想。那些曾将普京视为伙伴的人如果还想继续这样相信下去，就必须完全无视眼前的现实（而不是像此前那样部分地无视）；那些曾很现实地看待俄罗斯领导人攻击性的人必须认识到，以前以为克林姆林宫会被欧盟吓退而限制使用武力的设想是具有欺骗性的希望。

自从底线被突破后，很多以为不可能的都变得可能了，哪怕是公然的武力入侵乌克兰。如果这样，那么俄罗斯军队会驻扎在哪里？在顿涅茨克附近吗？他们会试图占领乌克兰整个东南部，甚或基辅？其他国家，比如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会有危险吗？既然俄罗斯领导人臆想与欧盟和北约有公开的冲突，那么他们有可能利用俄罗斯少数民族让欧元国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陷入混乱。哪怕只有一小撮愿意动用暴力的人群，只要受到相应的支持，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些都是很阴暗的设想，如果完全这样设想，并且沉浸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数月来，俄罗斯的各种媒体和重要政客就在制造这种气氛——是不对的。可是根据目前发生的一切，如果完全排除以上所有阴暗的设想也是错误的。我们对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和做事的逻辑有种不安感，这种不安感来自俄罗斯领导人的言论：普京将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南部”，他的一位智囊曾表示已经爆发了“第四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外交部长就欧盟决议发表的声明，完全蔑视基本的礼貌规则。另外，他们所有人一再展示其仍然极好地掌握了外交的表达艺术。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爆发后，西方尤其是欧盟仅仅做了一些反应：当俄罗斯让他们别无选择（这是施泰因迈尔的表达）时，欧盟做出了制裁的决定；当莫斯科释放出谈话意愿的混乱信号时，欧盟立刻回应，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就为了能促成对话，可是在对话时什么都不清楚，包括参与人、目的和成功的愿景。莫斯科一旦做出了承诺，西方就静观俄罗斯是否能遵守承诺；当俄罗斯让冲突稍微升级，欧盟便制裁和对话方式交替出现。现在是打破这种自动机制的时候了，因为在这个自动机制中，我们面对的对手不遵守规则，也不清楚自己的目的，可是他们操纵着事件的发展。当然，对每次冲突做出临时反应依然是必要的。但是目前这样行动和反应交替进行，时间长了将会陷入死胡同。欧洲人必须在下一个燃点被点燃之前彻底思考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现在所发生的并非暂时的气氛恶化。只要莫斯科没有彻底改变其政策，那么俄罗斯与几乎整个欧洲将会一直存在争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双重决议：西方必须加强自己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防御上的意愿。如果莫斯科看到俄罗斯继续耀武扬威的代价真的很大，这才有可能避免扩大冲突区域。同时，也必须向俄罗斯明确提出对双方都有明显好处的合作条件。西方必须找到一个公式，用这个公式明确向对手表示不希望有冲突，但是如果涉及价值观的话，西方不会退缩。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4 年 8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d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